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总编 李忠杰
副总编 周勇 李蓉 姚金果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 文化工作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主编 彭亚新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总编 李忠杰
副总编 周勇 李蓉 姚金果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 文化工作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主编 彭亚新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彭亚新主编;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98-0266-3

I. 中… II. ①彭… ②中… III. 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重庆市—1938—1945 IV. D235.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749 号

书 名: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

主 编:彭亚新

编 者: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高秀清 李树泉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162mm×230mm 1/16

字 数:378 千字

印 张:25.5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266-3

定 价:50.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总序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历史的重要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央工作机构,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党组织的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于前期筹建的“长江沿岸委员会”基础上,在武汉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全面领导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底,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

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至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其间,南方局实际存在大约八年之久,先后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王若飞等担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在这一时期内,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坚定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包括云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等)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南方局的历史,与此前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之后的中共中央南京局,以及东迁后在重庆建立的四川省委,还有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关系。因此,南方局的活动,基本上

涵盖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历史过程,它的光辉历史和卓著功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南方局把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向前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进行艰难复杂的谈判和合作,与国民党内妥协、分裂、倒退的倾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广泛争取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配合抗战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局面直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又配合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参与政协会议和停战整军谈判,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前景做出了不懈努力。

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主动与各中间党派广交朋友,与他们风雨同舟,促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等的建立;团结民族工商界投身抗战民主,支持他们反对官僚资本、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他们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中不断进步,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团结海外侨胞,争取他们对民族抗战事业的支援;抗战胜利后,发动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平民主运动,适时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化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南方局充分利用公开文化机构,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以雾季戏剧演出冲破顽固派的文化封锁,掀起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高潮;关心保护爱国知识分子,组织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香港大营救;鼓励进步知识分子开展社会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新中国储备建设人才;领导《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坚持“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宗旨,使之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南方局的文化工作极大增强了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造就出一支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

南方局配合中共中央领导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游击斗争,指导建立和发展广东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以及南路人民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开辟了敌后根据地;领导粤、滇、黔边、粤桂边、闽粤赣边等地武装斗争,使之不断发

展,壮大为成建制的正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建立功勋;领导地方党组织深入农村开辟工作,掌握部分武装,以应对日军入侵和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开展军事统战,推动国民党爱国将领参与抗战和支持民主,进而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

南方局把以工、农、青、妇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发展统一战线、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通过抗日宣传、募捐献金、战地服务,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在“反汪”运动、宪政运动中动员群众;按照“三勤、三化”要求,深入群众,建立据点,积蓄力量;动员群众参与反对“一党国大”的斗争,在领导胡世合运动中迎来抗战胜利;领导一二一运动,促进政协成功,在和平民主运动高潮中推动进步群众组织的建立;在领导群众求生存、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南方局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为指导,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特别是1945年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成为我党独立外交的重要开端。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在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空间,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方局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始终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思想上重视党员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组织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原则;工作上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党的组织始终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稳住了脚,使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成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带领人民坚持抗战和争取和平民主的中坚力量。

历史充分证明,南方局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胡乔木同志曾经

指出：“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宋平同志也曾经总结道：“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周恩来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做了非常有成就、非常出色的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不论是党的建设，从秘密工作到公开工作；统一战线，从基层到上层；文化战线工作，都做了很多工作。这些经验，在党的历史上确实非常宝贵。把这些经验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加以整理，加以提炼，就会丰富我们党的历史宝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在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光辉业绩、积累的丰富经验、培育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南方局的历史功绩和丰富经验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中共党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领导和原南方局所辖省区（市）党委支持下，成立了以宋平、孔原、童小鹏、荣高棠等部分南方局老同志为核心，有关地区党史部门业务人员为骨干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开始进行南方局党史资料的征集与编研工作，并很快在史料征集方面取得成效。1985年，经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意，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与有关地区党史部门共同确定，合作编纂六卷本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并纳入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系列，由此正式拉开南方局党史资料编研工作的帷幕。1990年6月，在中央及相关省区（市）党委的支持下，经过南方局老同志与各省区党史部门四年有余的努力，由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的六卷本《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正式出版，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座谈会。此套资料丛书的出版，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宣传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1990年初,完成使命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宣布撤销。

2002年5月和10月,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先后到重庆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南方局历史功绩,深刻阐述红岩精神,要求认真总结南方局的历史经验,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同年10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遵照中央领导指示,提出《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问题的意见》(中秘局[2002]97号),批复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以及重庆市委等有关省区(市)党委,部署开展新一轮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征编和研究工作,得到了各有关部门和省区(市)党委的高度重视。

2004年3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长沙召开协调会,就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开展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提出初步意见。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重庆市委有关领导在京向宋平同志做了汇报,得到肯定和支持。同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委在重庆联合召开纪念南方局成立65周年座谈会等活动。宋平同志专门发来贺信,鲁明、张颖、成元功等老同志以及相关省区党委负责人应邀参加,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镇东出席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期间,根据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正式成立了以宋平、荣高棠、童小鹏等为顾问,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为组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有关负责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安徽、江西、贵州、重庆等省区(市)党史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建立了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下,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内设的工作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提出了继续修改完善《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稿》,协作开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专题类书稿编写,以及选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等任务,并决定首先启动丛书专题类第一期六本书稿(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红岩精神研究》)的编写,以最终形成丛书“一主九专”结构的工作计划;确定了每年召开一次工作小组会议(由各成员单位轮流承办),以加强交流、研讨问题、检

验进度、部署任务的工作模式,并以《会议纪要》将相关任务固定下来。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南方局历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比较完善的工作机制。会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作出重要批示:“就是要通过我们扎实有效的工作,让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发扬光大。”

自此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由李忠杰副主任负责,进一步加大了对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的领导力度,从整体上统筹协调和组织部署每年的工作任务;有关省区(市)党委及党史部门认真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和重庆会议确立的任务,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从人力物力上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工作小组办公室也切实履行职责,在信息沟通、工作协调、档案查阅以及会议组织等方面提供大量服务。2005年11月、2007年6月和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相继在昆明、武汉、重庆召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李忠杰每次都亲自出席,对南方局历史研究和《丛书》编写工作提出指导性原则,把关定向,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同时检查工作进展,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提出明确的任务要求。每次工作会议主题突出、任务明确,对涉及南方局历史的重要问题展开研讨,充分交流意见,最后达成共识。这些工作会议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务实、认真、和谐、高效”的风格,并一直坚持至今,从而保证了以《丛书》编写为主体的南方局历史研究按预定计划顺利推进。正是由于坚持这样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作风,南方局的历史资料研究和编写工作一直保持着“年年有部署、年年有检查、年年有推进”的良好局面。

如何统筹规划丛书编写工作,保证丛书质量,是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一直注意的中心问题。每次工作会议,都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李忠杰副主任在2005年的昆明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编写工作的九条意见、要求处理好的十个关系,强调体例结构要坚持“横向展开,纵横结合,脉络清楚,反映全貌”的总要求,丛书各个专题之间要坚持“大系统、多侧面;大统一,小灵活;大分工,小交叉”的分工原则。在2007年的武汉会议上,又根据编写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在2008年底的重庆会议上,针对审稿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九条处理意见。历次工作会议对这些原则和要求都达成了完全的共识。经过各成员单位近五年的努力,现已编写完成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较好地遵循和体

现了这些原则、要求和意见,达到了“主题鲜明,观点正确;系统完整,结构合理;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表述准确,文字流畅”的要求。丛书集中反映了十几年来在南方局历史资料征集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进展,比较好地搭建起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学科体系。

现在,这套承载着南方局老同志的多年期望,寄托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凝集着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者们长年心血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终于出版了。这套丛书,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为主干,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红岩精神研究》等一期专题类六部书稿为支干,连同此前已经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回忆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图集》等书,共同构成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基本成果,是迄今为止对南方局历史及其功绩、经验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总结,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协作开展中国共产党专史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是党史工作者历史责任和攻坚克难敬业精神的凝聚。在此之后,我们还有若干专题书籍需要继续完成并出版,在成果转化上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但这一次这套《丛书》的集中出版,标志着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完成了主干工程,取得了决定性的成绩。

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我们全体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党所尽的历史责任,也饱含着我们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之情。我们谨以这套丛书,献给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2009年5月

前言

从1939年1月至1947年3月,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其间,经历了中共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南京局等名称的变化),团结带领广大文化人士,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南方广大地区以及港澳和海外,持续开展了规模空前、波澜壮阔的革命宣传文化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动员人民起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革命文化工作史上独具特色的壮丽篇章,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斗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动员广大人民支持和参加党领导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工作的任务也是如此。但由于国民党对革命文化思想的敌视和严禁,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工作的开展面临极大的困难。怎样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和阻挠,就成为实现党的文化工作目标的关键。南方局成立以后,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把建立和发展革命的文化统一战线、动员和组织文化界知识分子摆在文化工作的首要位置。在领导中共长江局时期建立起来的党的文化工作骨干队伍和文化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南方局及其各级党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在以重庆、桂林、香港等城市为中心的南方各地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里,推动各种民间抗战进步文化团体的成立,并派出党员进入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主持的文化团体,团结其中的进步文化人士共同开展活动。这些散布在各地、以各种名义各种形式出现的文化团体和机构,共同构成了党领导的广泛的革命文化统一战线,有力地推动

了抗战进步文化的蓬勃发展。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革命的文化统一战线备受摧残,进步文化团体遭封闭,公开的活动被禁止,进步文化人士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严峻的形势下,南方局一方面向香港、南洋等地转移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保护了文化统一战线的主要骨干;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改变斗争策略,减少统一战线公开和集体的活动,保持同进步文化人士的个别联系,使文化的统一战线在白色恐怖加剧的情况下保存了下来。同时,南方局组织戏剧工作者开展进步话剧的演出活动,振奋进步文化界的斗志,凝聚统一战线的力量,并采取“据点”这一形式,在国统区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建立和发展了民主斗争的统一战线。南方局的这些工作,使皖南事变后一度遭到严重摧残的文化统一战线不仅没有被打垮和打散,反而得到了恢复和更大发展,并在斗争中变得更为坚强。其重要的标志是文化界人士和广大青年学生进一步觉醒,积极参加到国统区的民主斗争中来,反帝反封建文化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更为牢固。在抗日和民主的斗争中,南方局与国统区爱国进步文化界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此后,不论国内政局如何变化,国民党的镇压怎样血腥和残酷,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汇聚在南方局周围。在抗战胜利后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斗争中,革命的文化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并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共同组成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新中国的建立进行斗争。与此同时,经过南方局领导的美、英、法等国的中共组织的长期工作,中国留学人员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也有了很大发展,组织广大中国留学生和学者阅读进步报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宣传新中国的方针政策,为大规模留学人员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经过南方局的长期努力,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一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文化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特点是:它以共产党员为核心、进步文化人士为骨干,在他们周围又团结和联系了更多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它没有统一的名称,各团体之间没有相互的隶属关系,但都接受南方局及其各级党组织的指导,共同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发起冲击;它公开合法地开展活动,有效地扩大了先进文化思想对社会大众的广泛影响力;它遍及国统区南方和港澳地区,并延伸到南洋和美、英、法等国的华侨和留学人员中间,涵盖了文化的各个领

域。革命文化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形成了党领导的文化工作骨干队伍同广大文化人士并肩作战、相互配合的工作格局,极大地壮大了革命的文化工作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只有少数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国统区孤军奋战的历史,改变了过去党的宣传文化工作只能秘密或半秘密进行的状态,有效地冲破了国民党限制,打开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使党的文化工作的面目为之一新。坚持发展革命文化的统一战线,是南方局文化工作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其最具特色的工作之一。

在建立和发展文化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南方局把引导文化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文化工作的主要任务。南方局成立以后,通过党的报刊和党员对进步文化团体的指导、组织革命文艺理论的讨论、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以及干扰进步文艺发展错误言论、组织文化界参加抗战和民主斗争的实际、树立文化界著名进步人士为榜样、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介绍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成果等多种形式,帮助文化界知识分子明确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建立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思想武装和影响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觉悟起来的文化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民族民主革命的行列,运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他们坚持文化抗战、发展抗战文化,鼓舞民众抗战到底;为了争取人民民主、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们面对残酷的迫害,坚持发展反对专制主义文化,向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发起一次又一次猛烈进攻,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了反帝爱国和民主进步的文化思想,为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奠定了基础。在开展文化斗争的同时,在党的文化骨干队伍和进步文化界的共同努力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个文化领域里,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产生了一大批重要而有广泛影响的作品和成果。党的舆论阵地《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党的其他新闻媒体,以及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等创办的各种报刊,形成了遍布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宣传统一战线,在宣传革命、动员群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文艺家创作了许多文学诗歌、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的优秀作品,在抗日救亡和民主斗争中动员和影响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持续数年的话剧演出活动中,产生了一大批思想进步、艺术精湛、影响广泛的话剧精

品,给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和专制统治以有力回击,开创了中国进步话剧发展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党领导的生活、读书、新知等书店,以及党员和进步人士合作创办的各出版机构,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抗战进步刊物和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类书籍,出版了许多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不断向人民群众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和前进动力。南方局通过帮助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帮助桂系创办干部学校,与民主党派合作创办达德学院等,向民众和青少年进行反帝反封建思想教育,在国民党统治区树立了反帝反封建教育的典范。南方局建立了一支由党内外学者和理论工作者组成的社科研究队伍,批驳唯心主义和反动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引导国统区人民不断前进,并在历史、哲学、经济的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帮助群众认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必然性。南方局把科技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引导他们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一支用新民主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科技队伍。南方局文化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大地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好了文化思想的准备。

在开展文化工作、发展革命文化的同时,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文化队伍,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动员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南方局领导党的文化骨干队伍和文化统一战线,在南方各地发动了广度和深度都超过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向民众宣传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抗战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抗战的热情。在中国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发动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初制造了围歼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南方局通过宣传文化工作,在国内外发起猛烈的政治宣传攻势,组织了规模空前的进步话剧演出活动,揭露事件的真相,痛击国民党同室操戈、分裂统一战线的行为,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统一战线方针,帮助国统区民众认识到,只有同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分裂、倒退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才能维护全民族的

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南方局在南方各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传播民主进步思想,积蓄进步力量,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使反独裁、争民主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共同行动。1944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后,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投入民主运动,进步学生担当了运动的先锋和生力军,共同向国民党专制统治发起冲击,使中共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动员了更多的民众加入民主斗争的行列。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先后同国民党进行了重庆谈判、参加了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南方局领导进步文化界,持续开展了此起彼伏的宣传文化运动,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民主的行为,动员民众起来制止内战、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建立。南方局通过持久、广泛、深入的宣传文化运动,唤起了人民的觉醒,使他们逐步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积极地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好了群众的准备。

地处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方局,是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际社会联系和交往的重要窗口,承担了对外宣传中共主张、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中国革命的重任。南方局贯彻周恩来制定的“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以重庆和香港作为两大对外宣传工作基地,长期开展工作。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不仅向海外华侨宣传中国的抗战,还通过宋庆龄在香港设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介绍中国的抗战,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为抗日根据地争取了大量物资、资金和医疗的支持。南方局在重庆与各国驻华使馆、援华机构和新闻记者广交朋友,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人民军队的战绩和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的成果,揭露批评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皖南事变后,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发动了猛烈的对外政治宣传攻势,向世界揭露事件真相、阐明中共解决事变的立场,促使国际社会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收敛反共行为,成功地配合了中共中央打退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南方局卓有成效的对外宣传,使国际社会逐步认识到中共是抗日的重要力量,代表了中国民主进步的方向,最终促成了1944年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和美军观察

组进驻延安,打破了国民党长期实行的政治和新闻的封锁,建立起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扩大了中共在世界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了其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地位。解放战争时期,尽管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但南方局仍同外国驻华使馆、驻华机构、外国记者和友好人士保持了联系,向他们散发有关材料,宣传中共的和平民主主张,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和平民主进程的支持。政协会议以后,为制止内战,周恩来通过军事三人小组,向美国代表宣传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和独裁统治,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向国际社会和国统区人民表达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从道义上孤立了美蒋反动派,为它们的彻底失败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南方局文化工作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杰出领导分不开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样特殊的环境里开展文化工作,仅靠共产党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能否建立和发展一支宏大的革命文化队伍就成为文化工作成败的关键。而文化队伍建立和发展的关键,又在于能否正确看待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所以说到底,发展文化工作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是文化工作的主体,正确地看待和团结他们,文化队伍和文化工作就能建立和发展;反之,一切都不可能。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主张爱国抗日和要求民主进步的,这就成为共产党团结联合他们的政治基础。长期革命斗争的经历,使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深知轻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因而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主张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周恩来是党团结知识分子的表率 and 典范,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是可以充分信赖的朋友和宝贵的人才,真诚地团结和依靠他们。从他的身上,知识分子切身感受到共产党是他们真诚可靠的朋友,心甘情愿地与党合作。邹韬奋、陶行知、范长江等一大批著名文化人士,都是在他的影响下,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虽然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要求,但不会自然成长为革命的战士,在充分信任和团结他们的同时,又要在政治思想上引导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危难之际帮助他们,推动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与工农大众的结合中不断前进。重视和团结知识分子、发展文化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是南方局留给全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

全面记录南方局文化工作的历史,总结其历史功绩和历史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革命优良传统,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南方局文化工作的史料征集、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大量有关的专著、论文和回忆录不断问世,披露了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史料,修正了一些过去不够准确、不够全面的史实或定论,这些都为编写南方局文化工作的历史提供了有利条件。从2004年起,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组织和指导下,原南方局所属的有关省、市、区委的党史研究室分工,启动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丛书的编写工作。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承担了其中《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的编写任务。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对编写工作的总体要求,编写工作遵循如下的方法和原则进行:

把握南方局文化工作的历史就是一部党的文化队伍和文化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动员人民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和主线收集和选择史料、展开论述,以充分反映南方局文化工作的历史功绩和经验。

对文化工作的定义不限于文学、艺术的狭义范畴,而将宣传、新闻、教育、出版、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工作等方面都包括进去,以全面反映南方局的文化工作,全面评价其历史功绩。

贯彻以史为主、史论结合的原则。史书的编写以记述历史为主,但又适当对其加以议论和评价,以达到不仅忠实记录历史,并且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达到启发后来者、资政育人的目的。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南方局文化工作的历史功绩和基本经验,本书在结尾部分专设一章,进行总体的评价和论述。

遵循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的原则。南方局文化工作的活动范围极广,其下的各地各级党组织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把每个时期、每个地方的文化工作不论巨细都加以记叙,不仅十分困难也没有必要。因此,突出南方局直接领导的文化工作,突出一个时期和主要地区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活动,才能突出南方局文化工作的主线和